

胡德培

书林守望丛书

文学编辑体验

胡德培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丛书得到韬奋基金会资金资助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胡德培

书林守望丛书

文学编辑体验

胡德培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编辑体验 / 胡德培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2
(书林守望丛书 / 吴道弘主编)
ISBN 978-7-81119-537-8

I. ①文… II. ①胡… III. ①编辑工作—文集 IV. ①G2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9795 号

书林守望丛书

WENXUE BIANJI TIYAN

文学编辑体验

胡德培 著

项目统筹: 张 巍

责任编辑: 张慧芳

责任设计: 张 朋

责任校对: 李佳艺

责任印制: 沈 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55 千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书林守望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顾 问 于友先 王万良 卢玉忆 冯俊科 伍 杰
刘 杲 徐柏容 巢 峰

编委会主任 吴道弘

编委会副主任 郑一奇(常务) 杨生平 杨学军 陈 鹏
陈芳烈 胡 越 韩方海

编 委 王维玲 方厚枢 邓中和 何启治 宋应离
邵益文 林君雄 周 奇 胡德培 赵 洛
俞 斌 聂震宁 钱锦衡 曹培章 熊国祯

做文化的守望者

——《书林守望丛书》总序

柳斌

文化是每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和灵魂，而出版事业和出版物，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物质承载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出版人，不仅是出版活动的实践者，而且是人类文化创造、积累、交流、传播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民族精神的护卫者和时代精神的弘扬者。任何时代，治书修史者都肩负着神圣的历史责任、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在我国，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但是，目前受名利诱导和网络快餐文化的影响，出版界跟风炒作、追求市场效应一夜成名而不顾文化品位等现象时有耳闻。在种种浮躁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出版从业者文化品格的缺失。唯其如此，为繁荣学术和民族文化而坚守文化天职、恪守社会责任的职业精神和文化追求，尤其值得在出版界大力弘扬。

001

出版人是文化薪火的传承者，具有坚守文化自信的历史责任。众所周知，出版是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依托，一个国家民族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有赖于它的出版事业。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一脉不绝，就在于中国历代政治家、著作家、出版家、藏书家接续几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尊崇历史、珍惜古籍、编修文献、善待图书、重视典藏的优良传统，他们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入历代出版物之中，一代一代地传之后世，肩负起了将一个时代的科学文化及思想智慧真实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的历史责任，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与时俱丰、愈加巩固。作为新时期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播的主体，当代出版工作者更加需要继承传统、关注时代，一方面自觉承担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整理、

批判、传承的责任，保持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延续性；另一方面推动文化创新和发展，弘扬和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在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以及同世界其他文明进行对话的文化自信力方面作出贡献，使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更加坚韧。

出版人是文化创新的推动者，具有坚守文化本性的特殊责任。作为一种文化生产的基本业态，出版既有产业的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必须通过创新来保持文化的独特品质和内容的先进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是出版工作者的不竭动力和显著特征，不仅是文化积累和产品制造的组织者，而且也是文化内容的选择者和把关者，当然应当是新知识领域的开拓者和新成果的发现者、催生者。一方面，知识的保存、生产和应用，文化和技术的传承、生产和原创，都是以出版活动为基础的。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出版物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另一方面，从造纸术、印刷术到当代激光照排系统、计算机王码汉字处理系统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出版人率先将新成果引进出版业，引发出版形式和内容的不断创新。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版人通过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吸收外国文化精华、把握时代需要，促进着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而现代出版史上鲁迅发现大批文学青年、叶圣陶对巴金处女作的慧眼识珠、巴金对曹禺作品的琢璞为玉的佳话，也反映了出版人所必备的发现新人新作的创新品质。在当前的创新型时代、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已然成为文化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迫切需要出版工作者发现、认识、扶持、推广，进而铺垫中华民族元气深厚的文化创新的阶石，培育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神韵独具的文化创新的活力。

出版人是时代思潮的引领者，具有坚守文化领土与文化阵地的社会责任。出版的本质不仅在于积累文化、创造新知，不断推出更优秀的文明成果，而且还在于按照一定的价值目标对社会现实文化作出评价，通过选择、把关实现对社会风气、学术思潮、文化倾向的引导。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借助“竹帛长存”所构成的社会认知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才唤起了“见贤而思齐”的文化自觉和道德自律。“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中心凝聚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的出版传播活动，将“科学”与“民主”汇聚成了思想解放的伟大潮流。在当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

化、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国际背景下，在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社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内背景下，承担着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传播先进文化的神圣使命的出版工作者，其选择、把关进而引导大众的责任更加重大，需要通过对精神生产加以规划与组织，对精神产品进行鉴别与加工，对文化遗产作出选择和整理，对社会信息予以筛选和传递，打造传承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精品力作，不断巩固主流文化阵地。这就要求当代出版工作者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变革的风气之先，不随波逐流，不跟风炒作，不断提高辨别真善美和引导大众文化、传播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能力，致力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历史已经证明，出版业作为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核心，如果没有文化理想和文化追求，便失去了发展的根基。而出版工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人文素养、文化责任、文化运作能力和学术品评能力，又直接影响到出版物的文化含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文化的坚守，不仅是一种出版理念，也是一项出版实践。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文化市场中，能否坚持文化本位，能否坚守文化责任，对新时期的出版从业者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书林守望丛书》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关于新中国出版人的精神文化启示录。其中反映出的经过沉淀而彰显的文化品格，尤其应该成为新时期出版工作者的精神支柱。这套丛书的作者，是一群深深地钟情于出版事业的文化守望者，他们在“书荒”时代辛勤耕耘，在“书海”时代坚持方向，恪守文化的尊严，组织、规划、策划、编辑、出版过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及具有学术价值、文化品位的标志性工程，主持、主编过一大批科学、人文、经济、教育等方面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知识读物，为全社会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作出过重要贡献。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勇于开拓、后启来者的创新精神和坚守精神家园、淡泊名利的文化风骨，堪称典范。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新时期的出版工作者形成一种更加清醒的文化自觉，在文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产生更多让世界为之惊喜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文化品牌，再现中华民族宏大的文化气魄。

当前，出版业的发展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样，要在

世界范围内的大对话、大交流、大竞争、大角逐中，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创造新的辉煌，需要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且能开阔视野、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尊重创造、包容多样的新型复合型出版人才，来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推动者。《书林守望丛书》汇集的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成长起来的十几位出版家在长期为人作嫁的职业生涯中的思想火花、书坛掌故，集中反映了新时期出版工作者的精神风貌，不仅抓住了时代的新变化，也深刻把握了出版职业的新要求。这套丛书的作者，或者长于出版规划，或者长于鉴赏加工，或者长于经营管理，但都有将丰富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的深沉思考。将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总结汇集起来，转化为鲜活的历史智慧和生命依托，对于未来的新型出版人才，无疑具有深远的精神哺育作用。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吸引更多才华横溢、富有创造力的新军投身我们的出版事业，使中国出版人的文化守望薪火相传，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功立业。

2009年7月

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缘 ——代序

一晃已到古稀之年。

回首往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我喜欢上革命的新文学。1955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1959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在中国作家协会所属《文艺报》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直到1978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迄今与文学结缘半个世纪，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约四十年。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常常有些想法，有些感悟，多与同仁们商讨和研究，结合工作从事写作与总结，虽然谈不上有多少创意或贡献，但在各个不同的编辑岗位上，还是尽我所能，努力去完成相关各项工作任务。

001

几十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使我深深感到：应该感谢文学，感谢时代，感谢社会，也应该感谢编辑部。因为融入新时代、新社会和新文学的编辑出版事业，常常会令人有兴奋和幸运的感觉。

编辑是“杂家”

在编辑工作中，多次听老编辑说：编辑是“杂家”。编辑要有一定的专业和专长，同时，在该领域里知识要广泛，不可过分专一，以致知识面太窄，工作时捉襟见肘。当然，也有人说：最好的编辑是专家和杂家的结合，即在本专业领域中，既是某方面的专家，又是兴趣广泛、知识广博的能人。这样，在本专业领域的各种工作都能拿得起来，干得顺畅，不会感到隔膜和陌生。就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来说，综合大学里中文系培养的就是这类具有语言文学领域各方面广泛基本知识的人员。学习内容

以中国语言文学为基础，包括古今中外语言文学及有关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随笔、小品以至通俗文学、民间文学的广阔知识，近些年还增加了关于现代传媒如电影、电视、新闻以至信息网络等方面的内容。

中文系毕业后，到报刊或出版社工作，具体岗位都是有不同分工的，越是专业的报刊或出版社往往分工越细。“文革”前七年，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所属《文艺报》编辑部，当时分为理论组、评论组、艺术组和秘书室（分管编务、资料和日常办公事务）。我最初在资料室工作的一年，为各组及整个编辑部提供资料服务。后来，主要在理论组负责“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专栏、关于美学问题讨论及一般理论批评的组稿、审稿和发稿，约有四五年时间。中间，曾在评论组分工小说评论、“新收获”栏目等的部分稿件；参加过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培养青年作者会议及作协参与组织的其他专业会议的简报工作和组稿工作，还为作协的整风、批判和《文艺报》发表专论、社论或某些讨论会、座谈会准备有关资料。1964年作协整风后，《文艺报》为加强文稿的把关、避免工作失误，成立了一个发稿组，在主编、副主编的直接领导下，我与另一位同志除日常工作外，同时参与每期的发稿、校对直至最后到印刷厂直接签发出版的全过程，约有一年多时间。后来，还协助艺术组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在《文艺报》编辑部门的各类工作，我大多曾经参加过，只是各占时间长短有所不同。

“文革”后，我到了全国最大的文学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这里，编辑专业分工更加细密：设有外国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美术等编辑室，还创办四刊一报，即《当代》、《新文学史料》、《新文学论丛》、《外国文学季刊》和《文学故事报》（两三年后，后两种刊物停刊）。后来，又陆续创办《华人世界》（后更名《海内外文学》）、《中华散文》、《中华文学选刊》等。开始，我在现代文学编辑室理论组做编辑。不久，任副组长，参与大型理论期刊《新文学论丛》的筹办及理论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同时，在大型文学期刊《当代》杂志筹办阶段，也曾协助做过部分工作。1983年，我被评为副编审，担任现代文学编辑室第一副主任（主任一职空缺），负责全面工作，同时兼任小说南组组长。1987年调任《新文学史料》副主编。1989年又调到当代文学编辑室当主任，被评为编审。其间一段时间，负责终审过《文学故事报》的文稿。

1992年调《当代》杂志当副主编，后任常务副主编。总起来说，在现当代文学各编辑部门，包括三刊一报，我都先后干过一段时间。在工作后期，有关社领导似认真又似开玩笑地对我说：“没想到，这些年你在文学出版社现当代文学的各个部门几乎都干过，也都干得不错。”仿佛是哪需要，就到哪里去。具体工作不断变换，真似成为了一名“杂家”式的编辑。

这种“杂家”式的编辑，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非常需要的。1979年的一次经历就给了我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那次，是理论组派我出差宁沪一线组稿，主要为《新文学论丛》和正在筹办的“论丛丛书”组稿。当社长严文井、总编辑韦君宜等领导同志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他们特别嘱咐我，到上海一定要去看望巴金。拜访巴老的目的，主要是向他索要他正在香港《大公报》陆续发表的《随想录》，同时，也要他的散文、小说等其他书稿。这显然超出了理论编辑的分工范围。

原来，巴金《随想录》的发表，在海内外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了强烈震撼，上上下下议论纷纷，引来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当时，诗歌散文组的季涤尘等同志与巴金早有联系。但值我出差之际，社领导还如此嘱托，使我感觉这次组稿任务的重大。同时，自然促使我更多关注文化思想界的有关动态，让我思想更活跃，眼界更宽阔。因此，到上海后，我即专程去到巴金家里，郑重地转达了文井、君宜等同志的意思。我们的热情和诚恳，得到了巴老的首肯。后来，《随想录》连续五本著作顺利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及时推出。事实证明，这部著作不仅是时代精神和世纪良知的光辉代表，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和社会历史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而且，它创始了一种新的文体——巴金文体。这是在传统散文、随笔、小品文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它平实而深邃，述真情、讲真话且直面历史痼疾，鞭辟入里，揭示伤痕，不留情面，锐利而深刻，是可与鲁迅杂文比美的一种真正的文学。

这件事，给了我深刻启示：编辑自然需要有一定分工，每位编辑在自己分工的范围内应独当一面，负起责任，不致有误，同时，还需要宽阔的视野，发展的眼光，不能局限于一隅，这对于真正做好编辑工作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在日常编辑工作中往往随时需要我们当“杂家”。

当代文学是“牡丹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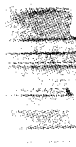
由于最初我工作在《文艺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也是做理论组的编辑，自然我脑子里常常是理论批评一类的习惯思维。但是，工作不久，领导上便让我负责整个编辑室的工作，而且重点兼任小说南组组长的编辑任务，显然是以组织和出版长篇小说为工作重心。后来，有一段时间，虽然分别管过通俗文学（《文学故事报》）和《新文学史料》等方面的文稿，但很快又回到主管当代文学编辑室和《当代》杂志的工作，所以，我主要是搞当代文学，尤其抓优秀长篇小说的编辑出版工作。

那个时期，编辑室里有三个分管小说的编辑组，即小说南组、小说北组和小说北京组，共有编辑约三十人，都是组织出版小说书稿的。每一两位编辑分管某个地区（包括省、市），负责那个地区的小说组稿与出版。比如，一两位编辑负责上海及苏、浙地区，另一两位编辑负责云、贵、川三省等等，同时有一位组长或副组长分工管理或协调那一两个地区的工作。有时工作需要，工作范围也会有所交叉合作。

004

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9年在国内率先创办大型文学期刊《当代》杂志，以“贴近现实，贴近时代”为办刊思想，广泛联系作家，及时刊发优秀的中、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等新创作，对于富有时代精神、及时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新创作，更是隆重推出。如王蒙的《布礼》，陈国凯的《代价》，郑万隆的《年轻的朋友们》，刘绍棠的《瓜棚柳巷》，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张贤亮的《龙种》，韦君宜的《洗礼》，郑义的《老井》，张炜的《秋天的愤怒》等中篇小说；冯骥才的《雕花烟斗》，叶文玲的《心香》，邵振国的《麦客》等短篇小说；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秦兆阳的《大地》，张锲的《改革者》，焦祖尧的《跋涉者》，苏叔阳的《故土》，柯云路的《新星》，刘心武的《钟鼓楼》，周而复的《南京的陷落》，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张炜的《古船》等长篇小说；理由的《她有多少孩子》，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鲁光的《中国姑娘》，何启治、刘茵的《播鲁迅精神之火》，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赵瑜的《强国梦》，霍达的《国殇》等报告文学和陈祖德的传记文学《超越自我》，都是首先在《当代》发表出来，继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

那时，韦君宜等老同志反复告诉我们：当代文学创作是文学出版中



的一朵“牡丹花”。因为，尽管古今中外各类文学书籍我们全都出版，但就我们这辈人来说，对我国文学出版事业真正做出开创性首要贡献的则只有当代文学创作。中国过去的优秀文学创作和世界各地的文学名著，那是前人或外国人的功绩，我们是捡现成的，拿过来整理或翻译就可以出版。只有当代文学创作才可以说是我们这代人对人类文化事业的新贡献。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又应当首推长篇小说创作；它是文学创作中的重中之重，往往标志着一个国家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就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来说，最大贡献常常即表现在对优秀长篇小说的组稿和出版上。因为，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以及中、短篇小说和戏剧等等，最初发表大多是在各个报刊上，出版社编辑仅仅是从那些已经面世的作家作品中遴选结集成书出版，首发则功在各报刊，那是他们对文学工作的成绩、对社会的贡献，出版社编辑的作用自然居于次要地位。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家一贯重视对当代长篇小说的组稿和出版。往往在作家刚刚冒头，发表出有一定特色的中、短篇小说或其他创作时，编辑就主动与作家建立较密切的联系。所以，当作家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时，大多会较早想到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文革”前，除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当时唯一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首发过少数几部长篇小说以外，其他绝大多数长篇小说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发。我在人文社工作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经手编辑出版的长篇小说约占“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一半以上（近些年仍大略保持这个比例），计有魏巍的《东方》、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王火的《战争和人》、宗璞的《南渡记》、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刘玉民的《骚动之秋》等，除最后两三部外，其他都是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

在人们长期以来的习惯认识中，牡丹乃国花之首。在文学出版事业中，首推当代文学，同时又以长篇小说置于当代文学第一重要的位置，便是基于上述的认识和考虑。

为了有力地促进和鼓励作家及其创作，人文社先后多次举办“人民文学奖”“《当代》文学奖”“春天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等多种评奖活动，给作家们以具体的支持、鼓励和帮助。

我在当代文学编辑室和《当代》杂志工作期间，有几部长篇小说书稿的组织出版就是贯彻人文社一贯的编辑出版方针的。

在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前后，我们接受出版王火的《战争和人》与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两部长篇小说，其规模和思想艺术分量在描写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中都是空前的。《战争和人》拟写成三至四卷，一二百万字，《长城万里图》拟写成五至六卷，三百多万字。它们都是多侧面、全方位地表现抗日战争，包括国共两党各方面的人物和事件以至国际范围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以全景式的艺术结构来反映。两部小说，从写作到出版均花了十几二十年时间。事后证明，这两部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描绘伟大抗日战争全过程的现实主义巨著，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两部巨著出齐以后，均获得了多种重要奖项，《战争和人》曾居于“茅盾文学奖”的榜首，《长城万里图》曾名列“五个一工程”奖的序列之中。这是于砚章、刘海虹、王笠耘等多位编辑及整个编辑部门共同努力的心血结晶。

在 1989 年的那场风波之后，时任中央文化部部长的王蒙请求辞职获得同意，准备集中精力从事写作。可是，在某些人的眼中，仿佛他常常代表着那些时代弄潮儿的某种思想观点，有人甚至写文章将他作为指摘的对象。这时，一些怕麻烦的编辑便多多少少冷淡了正在积极投入长篇小说创作的王蒙。我觉得，王蒙是当代文学中不可忽略的一位作家。因工作关系，我便几次走访了他，表示我们愿意出版他的新创作，包括他已写和正在写作的中、短篇小说集及有关创作谈，特别希望他正计划创作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能陆续交给我们。我及时向社领导陈早春、李曙光等同志汇报了有关情况，并请主管我们编辑室工作的副总编辑李曙光与王蒙直接见面约谈，然后在编辑室又先后指定彭沁阳、王晓等同志随时具体联系。在我们多位编辑积极、诚恳的努力下，王蒙最终答应将其著作一部接一部地给人文社出版了，其中大部分还优先在《当代》杂志发表出来（《当代》是由汪兆骞具体联系）。“季节系列”以小说形式，连续集中描绘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几十年的心路历程和坎坷人生，给我们提供的丰富人物形象和多样生活景象，获得了文坛内外的众多好评和肯定。

就是这样，我们每年至少推出一二十种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充分地体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着力抓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把长篇小说创作作

为重中之重的编辑出版思想。因此，人文社出版的有关书籍，一直是当代文坛和文学研究部门备受关注和重视的对象，这也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人注目的积极贡献的一个重要部分。

写作是“总结”、是“促进”

在《文艺报》工作，常有采访任务，需要写报道；编辑部及中国作协召开讨论会、座谈会，也需要整理简报或综合报道。当时，主编张光年（光未然）、副主编侯金镜、陈笑雨（马铁丁成员之一）、冯牧等，都是著名作家、评论家。他们常写评论、社论或专论，在《文艺报》及各报刊发表。他们在编辑部总是积极支持年轻编辑多动笔、多写作，认为这是做好编辑工作十分重要的一环。因此，从那时开始，逐渐促成了我一边做编辑工作，一边进行研究和练习写作的习惯。



严文井与胡德培(1999年)

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社长严文井、总编辑韦君宜以及秦兆阳、楼适夷、牛汉、绿原、孙绳武、屠岸、李曙光（黎之）、孟伟哉、陈早春、王笠耘等领导，都是能编会写的作家、编辑家。他们很快推我到了负有

一定责任的编辑岗位上。要做好工作，便需要多思考、多总结，要不断提高和锻炼自己的眼光与能力；结合编辑工作的写作，便自然成为思考和总结，并成为锻炼和提高自己编辑工作水平和组稿预见能力的一个重要方法。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学习和思考结合工作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态势；二是探讨艺术创作规律。

要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态势，主要是通过对当前作家作品的细致分析，并参阅中外文学发展历史，尤其是结合大量现当代文学进行纵向或横向等各方面的比较研究，从而透视当今文学可能会有某些前进迹象和发展趋势。由此，我写了《当今文学的过渡特征》《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多卷集创作变异论》《抗战文学的新发展》等论文（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瞩望星河——近二十年中国长篇小说艺术》一书）。同时，分析研究创作艺术的某些具体规律，写作了《艺术规律探微》的系列文章（先后出版两本集子）。进一步，便试图把具体作家的具体情况放在整个社会历史和创作发展环境当中进行比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把握某些作家的创作发展状况，预示他们在一定时期的创作潜力以及可能创作出达到什么样水平的作品来。在这样一些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于那些有潜能的作家，我们便尽量提前向他们约稿，与他们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经历及文化艺术修养等等，进而帮助他们挖掘创作潜能，及时启发和鼓励他们写作长篇小说。人文社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是韦君宜组织张洁写作《沉重的翅膀》的经历。

1978年，早在张洁刚刚写出《森林里来的孩子》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时候，韦君宜作为评奖委员就发现了张洁的写作才能。当认识并深入交谈后，韦君宜觉得张洁很有可能写出较成功的长篇小说来。于是，韦君宜当即鼓励她，并直率地向她约稿。在韦君宜的启发和帮助下，张洁于1981年写出了我国第一部以改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被公认为是一部有独特见解和生活底蕴的优秀创作，后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们从韦君宜等老编辑的成功组稿中得到不少启示和教益。

再一个例子是我们组织宗璞写作《野葫芦引》的过程。宗璞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女儿，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家学渊源，学贯中西，早在1957年即发表短篇小说《红豆》而闻名于世。我与她在上世纪60年

代初期曾是《文艺报》编辑部的同事，一直关注她的创作，1978年她发表《弦上的梦》不久，我写过评介她创作的文章。她家上下几辈人及其亲属多系知识分子，她早就有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的计划。因此，我们社组织的创作活动便不断邀请她。我曾多次与她交谈、约稿，她总是诚恳地表示首肯。有一次，她动情地对我说：我很感谢你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我写作短篇小说的时候，让我参加一次你们组织的创作座谈会，我写出了《三生石》等中篇小说；后来，你们又组织了一次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促使我开始写作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同时，她十分肯定地表示：我写成了就会交给你们的，不会给别的出版社。经历二十年艰苦的创作，《野葫芦引》的前两部《南渡记》、《东藏记》（王小平、杨柳等任责编；后两部拟名为《西征记》、《北归记》）已先后出版，并成功获得“茅盾文学奖”。2001年，宗璞在《衔一粒沙再衔一粒沙》的一篇文章中说：“这部书二十年前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从老一代韦君宜等领导到现在的领导都很关心。80年代初，君宜同志对我说，‘你现在到了可以写长篇的阶段了’。现在想想，这真是一句不简单的话，对于一个作者，她可以看出你现在到了可以写长篇的阶段。一位出版家关心着作者的发展阶段，是何等的眼光和气度。……在这样长的日子里，有时完全看不到交稿的希望，而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来没中断和我的联系，他们耐心又细心，让我感到的只有关心而没压力。……稿子交给他们，我完全放心。”

正是这样，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管当代文学的编辑同仁们，从老一代编辑到现今一直注重研究文学发展趋势和具体作家的创作艺术特征，从而及时联系并有效地组织他们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为促进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不断贡献着力量。

探讨“编辑学”

我较长时间担任编辑室主任和刊物副主编，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当代文学的发展变化，编辑人员的变动也较大，常常感到新毕业的大学生或从别部门调入的人员，要很快适应并融入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部门这个集体，是需要必要的培训或磨合的。过去，大学生到了出版社，总是